

邓光济与贵州医学教育近代化研究

吴中旭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清末随着西学入黔,西医传入贵州。贵州留学生逐渐出现,伴随着留学生归黔,他们在贵州近代社会的多个方面做着贡献,在推动贵州医疗卫生近代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建立了基础的医疗卫生机构,这些机构成为了近代医院的雏形,留学生中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个体,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医疗卫生知识,培养出专业的医疗队伍,为近现代贵州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医疗近代化;西医;贵州;近代医院

关于留学生与区域近代化的问题,从区域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将历史问题置于具体的地理位置加以思索审视,以小见大。将个人贡献置于区域近代化的角度进行审视。侧重于对个案的分析探究,从微观具体的事件入手分析对近代化进程的影响,重视个人在区域近代化中的作用研究,不同以往偏重于群体在区域进程中的作用,从微观中把握宏观,研究更加往精细化的方向进步,可以得出很多关于近代化问题的思考。关于留学生与区域近代化已经出现部分文章,这些文章运用的史料十分丰富,论述问题也有独特的见解,但是在留日学生与区域近代化的关系上仍然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发掘,留日学生在贵州近代教育中的具体作用有待研究。留学生中的个体如何牵引贵州医学发展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区域近代化指一地区民智之启发、思想之解放、经济之发展。涉及区域社会的多个方面,医学的近代化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贵州近代医学的发展一直面临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限制,随着近代中国国门的打开,西学传入贵州,医学知识渐渐传入。贵州历史上是偏远闭塞的多民族高原省份,文教发展相对困难。贵州近代教育起步艰难。近代贵州医疗体系的建立更加离不开个人的努力。

1 近代医学发展艰难的原因

1.1 历史文化因素

明末清初,由于久经战乱,社会动荡,当时的贵州学校受到破坏。直到吴三桂叛乱平定,社会渐趋安定,学校教育开始复苏。尤其是在“改土归流”以后,总督和巡抚力主“新开苗疆”发展教育,并发展教育作为“重要任务”^[1]。贵州学校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教育的普及,提高了贵州整体的文化水平,名师大家,蔚然而起。尽管明清时期贵州的文化水平相比之前有所提高,但是与全国省域甚至周边的云南、广西相比,人才的产出依旧稀少。这里的“人才”,主要指明清时期中国顶尖的专家和学者。人才的区域出现和发展,除了社会生产力还存在一种人才相互影响的效应——马太效应,人才的生长需要对应的社会环境刺激,需要榜样的感染、激励和提携^[2],也需要文化和精神的沟通互动。像江南那种经济基础雄厚的地区,人文渊薮,人才聚集,贵州区位优势相对较差,虽然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进士举人,但是能成为贵州地方的文化领航者、对贵州社会各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不多。除了以上原因之外,贵州教育起步艰难还受到清朝贵州当局在教育上投入不够、浑浑噩噩的态度造成的,部分地方官员不了解近代教育,对现代科学知识也漠然不顾。近代官员仍然认识不到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先进性和必要性,官员不作为,加大了贵州教育发展的困难程度。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依旧十分落后,人们既认识不到西方医学的积极之处,又认识不到传统医学的弊端。“西

学东渐”之后,西医慢慢传入中国,大规模传入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主要在上海、福州等沿海口岸,由沿海逐渐向内陆辐射,但是西医在贵州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发展。贵州地形闭塞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当时妇女生产、生病不到医院就诊,是当地的老中医、接生婆和巫婆进行治疗,这些人没有受过专业、整体的医学培训,使得患者的病情得不到好转,婴儿死亡率增加,这也阻碍了科研与治疗的进步。文化的开明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人的思想解放一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2 经济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贵州近代经济基础薄弱,山路极多,水文特征繁杂,河流分布较多,运输书籍的代价高,医学器械资料不易获取。贵州近代医学的发展还受技术制约,缺乏西学医师,医学的专业性较强,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并且培养成本较高。适时贵州财政捉襟见肘,不仅缺乏培养经费,而且缺乏系统的医学教育体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凭借不平等条约,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紧了西南地区经济侵略,取得了在贵州“传教”和掠夺土地的特权,外国资本侵占贵州,加重贵州经济的负担。同一时期贵州军阀混战,主政贵州的军阀不断更换,滇川黔军阀在贵州相互征战,军阀集团各自发行货币,大量地方性货币流通,使贵州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极不稳定,这也导致市场混乱,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医学教育发展更加困难。

2 近代医学的起步

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和留学生的涌现离不开“西学入黔”的社会背景,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国家发生巨变。魏源、冯桂芬等启蒙思想家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虽然贵州此时有少数人感受到时代的呼唤,但整体依旧笼罩在传统的酣梦里,此后几十年,西学知识逐渐传入贵州,适时贵州不完全具备近代思想知识生根成长的土壤,知识分子收到的西学信息需要外界输入,而这种传输渠道一直受阻。激活贵州的代表人物有李端棻等部分开明官员,他是京师大学堂的倡议者,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充军新疆,于1901年赦回原籍,他在贵州宣传新学,传播新知识,启蒙贵州学子,为贵州思想文化注入新动力,在贵州推广新式教育,建立了贵州第一所新式师范学校——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师范学校),作为推广近代教育的重要基地,培养了先进的师资力量,对推动新式教育的建立、新式人才的涵养,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贵州1901年已有留学生赴日学习深造,林绍年任云贵总督后,把兴学育才列为振兴贵州的“本中之本”^[3],1905年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全年累计资送官费、自费留学生151名,所学内容涉及农学、医学、法律各个方面,据《贵阳市志》记载,贵阳出现西医是20世纪初,是贵阳

人程乾生在北门螺蛳湾开业为病人治疗,他是贵州最早的西医师。此后到民国初年,贵州西医院鲜有记载,西医师的数量更是寥寥无几,更加谈不上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可见贵州近代西医传播缓慢,医疗卫生水平相对较低。

2.1 近代医院的诞生

邓光济,贵阳人,留学归来后于1919年和贵州省长组建贵州第一所公立医院,邓光济担任院长,并且从西方购进医疗器械及药物等其他医疗基础设备。适时医院只有医生几人,不分科,病床8张,到1930年,病床增至40张,并设产科病房^[4],这里涉及医院变革,近代医院是建立在“委托制”的基础上,与传统的中医治疗——医生坐堂看诊或者应邀上门的方式迥然不同,把病人托付给人看管、照顾,不同于传统的亲属看护病人的方式,通过医师和护理人员组成的团队治疗。委托制能够给病人提供更加专业的术后治疗和康复,让病人体验一整套的专业护理模式,一方面有助于病人的快速康复,另一方面更加有助于医院的正常管理与运作,这也是近现代医院基本的运行模式,有着系统严谨的医护体系和富有人道关怀的医患关系,体现了医疗观念、管理模式创新。省立医院病床数量逐年递增更加说明了医疗卫生体系得到了革命性的改进,并且在医院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

为了推广发展西医,进一步传播和发展西方医学知识,邓光济在1927年主编《卫生半月刊》,1931年任贵阳西医公会主席,创办《新医药刊》,并编著《医药卫生论说集》和《中医临证疗法汇编》。这两本书介绍了基本的医疗知识,尤其是在妇女产后护理方面有着详细论解,以及术后护理、保持卫生、等方面有大体的介绍。其中《中医临证疗法汇编》内容见解独到,是贵州省中西医有结合的罕有比较早的一本著作,是根据对患者病变症状的观察分析从而做出对病症的正确处理,并且结合西方医学的学术理论。邓光济还组织专业或普及型的书籍出版,其中有《卫生周刊》、《中医旬刊》、《救护通讯》等。这些刊物从大众化的角度普及了基本的卫生知识,让人们对症疾、麻疹等一些流行病有了基本的预防知识。也是用近代新媒介宣传新式医学,本质上是意识到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性。期刊和书籍的出现,输入了西方医学知识,也为后来医学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参考素材,这类医学书籍的出版也为贵州后来的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学术基础。

2.2 医疗教育事业的近代化

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贵州封建习俗严重,卫生保健以及妇女产后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存在极大的问题,传统接生法存在弊端导致婴幼儿夭折率较高,妇幼医疗工作难以开展。老百姓受到传统封建意识的束缚,都传说吃了西医药会绝嗣,打了针有生命危险,推进西方科学接生法尤为困难。省立医院妇产科是邓光济妻子岩濂担任医官,助手仅有两人。为了展开工作他们四处劝说病家,克服种种困难,深入浅出的讲解基本医疗卫生保健知识,让病家对西方医学知识有一个基本的、合理的认知,主动为患者接生,疗效很好,逐步得到群众信任,他们夫妇的医疗团队的爱心行为挽救了不少妇女和婴儿的生命。正是由于他们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渐渐赢得了患者产妇及其家属的信任与认同,并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从而为他们的妇幼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打开了局面。邓光济又开贵州省妇产婴医科传习所,自认所长。然而由于技术力量薄弱,医疗力量有限,为了培养更多的妇幼医疗卫生保健人才,为此,他们请当时的省长

公署行文至各县,要求选送当地好学优秀女青年前来传习所学习,希望把有关妇幼卫生保健方面的技术和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发展扩大医疗卫生力量。因此组织年轻妇女来学习妇婴接产、医疗保健等技术,由岩濂主讲。开办数期,培养学员百余名,有的留院做助手,有的回本县建立妇产保健组织,成为妇幼工作的骨干力量。这些举措,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西方医疗知识,也为后来贵州各类医院的成立提供借鉴范例,并且有利于促进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的扩大,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风气——注重公共卫生的发展。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防治疟疾、霍乱、流感等传染病的重要性,提高了人们的公共意识,同时也促进了对卫生理念的进一步认知,原来传染病这方面的知识欠缺,并且缺乏相关意识,这些举动无疑打开了公共空间认识的大门,梁启超曾认为,由于中国千百年的专制统治,国民形成顾己失大的缺陷,“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顾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逸群之我。”^[5]公共事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之间人与人的“固化”状态,这些举措的开展空前提高了人们的公共意识,邓光济和其妻子为贵州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3 结语

邓光济等其他留学归来的参与贵州医疗卫生事业的知识分子,促进了医生这一职业群体在贵州的壮大,推动了医学科研和临床治疗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西医的看法,破除了对传统中医的迷信,促进了近代医疗卫生观念在贵州的传播。总体来说,贵州近代医疗事业进步较大,体现民众对公民意识逐渐重视,崇尚科学的风气渐浓,促进了医生的职业化和系统化、医学教育的专业化,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习惯。这对于贵州社会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加大对贵州的扶持力度,引导贵州科教文卫的发展,继续深入实施“文化立省”“教育立省”的基础策略,继续推进文化产业教育事业的发展,贵州的文明程度进一步加深,文明成果遍布贵州社会的多个方面,回首贵州近代进程的艰难起步,仍是一个相对缺乏文化资源的地区。要实现贵州文化进一步的发展繁荣还需持续的努力。贵州医疗、法律、金融等各行各业的发展繁荣仍然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经济实力进行支撑,贵州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还需要社会各阶层经久不息的持续贡献。

参考文献:

- [1]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贵州通志 宦迹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 [2] 梁中美:《晚清民国时期贵州留日学生与贵州近代化》,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 [3] 林开良, 林朝晖著.《贵州教育溯源》.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 [4]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 卫生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 [5] 姚钟伍主编.《贵州文史资料选粹 教科文卫篇》.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 [6] 梁启超著; 摩罗, 杨帆编选.《太阳的朗照 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作者简介:

吴中旭(1998.6)男,汉族,河南周口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20级在读研究生。